

紅旗歌

蘇平如
船

PDC

論『紅旗歌』（代序）

周 揚

《紅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蘭州等城市陸續演出，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特別是工人們的歡迎。在上海已連演一百四十八場，現在還在繼續；在南京的演出也突破了從來該地話劇賣座的紀錄。

這個劇本的成功，是偶然的嗎？

對於這個劇本，不祇根據它的演出效果，而主要地根據劇本本身思想藝術價值的具體分析，作出一個比較恰當和正確的評價，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關於這個劇本已有各種不同的批評的意見，有些批評的意見是不恰當、不正確的，對它作一比較恰當和正確的評價，就更有必要

了。

必須肯定，《紅旗歌》是一個好劇本。它之所以好，就在於：它是第一個描寫工人生產的劇本；它用藝術的力量，表揚了工人在生產競賽中的高度勞動熱情，批評了工人中的落後分子，也批評了某些積極分子對待落後工人不去耐心團結教育而祇是譏諷打擊的那種不正確的態度；表揚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風，批評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這一切都通過了活生生的個性的描寫。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彫塑與語言的運用上顯示了優秀的才能。這就是爲甚麼，這個劇本具有教育人、感動人的力量；不管它還有某些缺點甚至比較嚴重的缺點，我們要給予這劇本以較高的評價。

劇本的故事是發生在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勝利進攻，人民革命領導力量開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時候。我們進入城市第一個遇到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依靠工人，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學會管理工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不得不克服一個特殊的困難，就是：由於我們黨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退入農村，在農村堅持鬥爭二十年之久，在這二十年當中敵人一直佔據了城市，因而造成了共產黨與自己的階級——工人階級長期隔離的狀態，以致我們勝利回到城市的時候，不但許多工人受了敵人長

期欺騙宣傳的影響，對自己的政黨不能立刻認識；同時我們的許多幹部，他們大都是農民出身或是長期在農村鬥爭過來的，對於自己的階級羣衆、城市產業工人也一度發生了生疏的、『格格不入』的感覺。許多幹部曾經缺乏明確的『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而如果這個根本思想、根本立場不建立起來的話，我們是沒有辦法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把工業管理好的。這種思想上的模糊，受到了黨的及時的提醒。解放以後，工人階級在生產戰綫上所表現的高度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及他們所創造的各種模範事蹟，充分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同時也大大加強了我們許多幹部的『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

『紅旗歌』第一次把工人在生產競賽中所表現的高度的勞動熱情及在生產競賽中所發生的問題搬到了舞台上。

劇本一開幕就展開了生產競賽的熱烈的場面。女工們完全捲入紅旗競賽的熱潮中了。當細紗組生產組長也是工會分會主任的老劉說：

『這些小閨女們哪，看着那紅旗比命還值重哪！』

一個女工馬上答嘴：

『我們自個兒爲了積極生產，發動的競賽，自個兒流汗爭來的紅旗，爲甚麼不值重呵！』

這些女工們爲了爭取紅旗，飯不吃、水不喝地幹着活。正如組長老劉所說的：『半年以前沒解放的時候，他們作夢也沒想到會過這麼痛快，也沒想到這輩子還有這麼大心勁兒……』工人們一經解放，他們的政治覺悟就很快得到啓發和提高；他們蘊藏的勞動的創造的熱情和精力就會像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噴射出來，他們憑着這股勁兒就能夠改變世界的面貌，創造出歷史的奇蹟。在競賽中湧現了大批積極分子，他們和落後分子劃分了顯明的界綫。一切工人，前進的和落後的，都將在競賽中受到嚴格的考驗。

下面是一個年幼的積極分子仙妮和一個同樣年幼的但是盲從的落後分子小美姑之間的一段有趣的對話：

〔仙：……這會兒工廠是咱們自個兒的啦，爲咱自個兒幹活兒，積極生產，支援前綫，得了紅旗多光榮呵！

小：光榮？——光榮也吃不了的，也喝不了的，有什麼用呵！

仙：多勞多得，你不知道嗎？得紅旗多了，到年底還發獎金哪！

.....

小：到年底還有好幾個月哪，誰知道到時候發不發呀？——你們沒聽我芬姐說呀，反正這會兒我們知道得了

紅旗也不多掙一斤小米兒，不得紅旗也不少拿半張票兒，光圖幹活兒緊哪？——我們才不當那傻瓜蛋哪！』

對於紅旗的何等不同的看法呵！在這裏就顯示了工人中的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的全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勞動態度。一個把工廠看成自己的，把得紅旗看成頂光榮的事；一個仍然以過去工人對待私人廠主的態度對待國家工廠，仍然抱着多掙錢，少做活的老主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已經開始有了主人翁的感覺，一個則還根本沒有這種感覺；她仍然保持着舊的習慣和舊的思想。

作者在這裏作了一個戲劇性的安排：兩個小鬼的吵嘴不過是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兩方面的一個前哨戰罷了，接着登場的是雙方的『兩員大將』，被稱為『瞎積極』的張大梅與被稱為『馬蜂窩』的馬芬姐，她們圍繞紅旗競賽展開了一連串的鬥爭，成為劇本的中心糾葛。作者從始到終貫串了這樣一個思想：就是工人中的前進分子必須耐心地團結、爭取與教育落後的分子。

所謂『依靠工人階級』，是甚麼意思呢？主要就是依靠工人的覺悟性與組織性。對於工人中的落後分子必須啓發他的政治覺悟，鼓勵他的勞動熱情。對於已經有了覺悟的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必須進一步提高他的覺悟程度，提高他在生產勞動中的團結互助精神。

劇中作為落後工人的突出的代表的，是被積極分子罵為『頑固堡壘』的馬芬姐。馬芬姐是怎樣一個人呢？據作者的介紹，她是『一個被舊世界的剝削、壓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她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曾兩次毫無理由地被開除，因此她給工廠記下了『大仇』。解放了，但在她看來，『今天解放啦，可是工人還不是窮工人，助理員還不是助理員，人家還不是把咱當成拉套牲口的？』特別是對於那位解放前開除過她，解放後還是那樣看不起工人的助理員萬國英，她一直記着仇。她完全用舊的眼光來看解放後的工廠和管工人員。『沒有哪一回工廠不是向着管工的，還能向着咱們窮工人？』對於競賽，她自然是反對的。『甚麼競賽，紅旗，還不是哄你們多幹活兒！』在競賽的羣衆熱潮中，她感到了孤立。『競賽才不過兩個星期，總共也只有二十天，就讓你們弄的我站沒站處，立沒立處，沒處藏，也沒處躲！？……你們把我當成大囊車子似的，誰見了誰恨，走到哪兒哪兒臭！』在這種情況下，她就越發嘔工、跑車、甚至扔白花，直到最後扔下圍腰、證章，走出工廠。

馬芬姐這樣的人物是現實的嗎？不管作者對於這個人物的孤僻倔強的『個性的過份渲染』，這個人物的落後思想心理是有它的社會根源的，是有它的一定的代表性的。工人與廠主歷來是處於一種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

削的關係。職員雖然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由於他們工作職務、生活條件、思想意識比工人不同，因此工人與職員，特別是一些比較更接近資本家的上層職員之間，在過去也常常處於一種對立的關係。原來屬於官僚資本家的工廠，現在屬於人民的國家所有了，因而工人與工廠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廠是工人自己的了』。但是要使每個工人意識並且適應這個變化，這就需要他在思想上認識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並且根據他親身的經驗來達到這個認識。工人與職員的關係也要經過一番團結的努力才能獲得協調。蕭殷同志在評『紅旗歌』的文章（載『文藝報』第十一期）中，認為像馬芬姐那樣『在舊社會被壓迫得深重』的工人『應該很容易接受新社會的思想，很容易理解新社會與舊社會在本質上的不同』，他懷疑在解放了半年以後的工廠，還會有像馬芬姐這樣『頑固』『落後』的性格存在的可能，因此他覺得『馬芬姐這個人物是不現實的，是缺乏社會基礎的』。『應該』是一回事，『可能』又是一回事。在解放不過半年時間，工人的政治覺悟還沒有普遍提高，工人物質福利還沒有根本改善的情況下，工人中有像馬芬姐這樣『頑固』『落後』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現實的，並不奇怪的。就在今天也還是如此。

認識新社會與舊社會的本質的不同（不是表面上的

不同)，並不是像蕭殷同志所說的那樣一件容易的事。不錯，馬芬姐在舊社會受過壓迫，反抗過；但那不過是一種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對舊社會的這種反抗，到了新社會就不完全合拍了，有時反成爲個人與新社會結合的障礙。這樣的情形是常見的。認識和適應新社會，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對於舊社會所遺留給人民的壞習慣和壞思想，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估計，用長期教育的工作去改變它們。蔡天心同志在《『紅旗歌』的主題思想》一文（載同期《文藝報》）中，也同樣忽視了舊社會遺留給廣大人民思想上的壞影響。他說：『舊社會，工人階級在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之下，爲了反抗，工人也學會運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反對統治階級，怠工、破壞，但一般的都是團結一心，而不是工人們彼此互相傾軋、誣陷。就是最沒有覺悟的工人，也還講一些義氣，而不肯做損人利己的事。只有少數沾染了剝削階級意識的流氓工人，才專門誣陷別人，而這樣人也大都是統治者的狗腿子。』在這裏，蔡天心同志祇看到了大工業的發展與工人階級的利害一致，促使工人團結了起來，但他沒有看到舊社會的各種統治者如何用收買、分化等等方法來破壞工人的團結；工人中的行幫、宗派，對於工人的團結發生了多麼有害的影響。一百年以前，《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

口號，今天還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共同奮鬥的目標。因為民族的、地域的、宗教的、政治的種種原因而被分裂了的全世界工人階級要在共同的政治方向下通過各種具體行動而日益擴大地團結起來，這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偉大的任務。如果工人已經『團結一心』了，那還用得着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用極大的努力在廣大工人羣衆中間去進行團結工作和教育工作嗎？難怪在蔡天心同志看來，馬芬姐既然那麼落後，不，簡直是『無法無天』，對於她就應當實行『組織處分與紀律制裁』，而不應當那麼委曲求全地去團結和爭取她；他認為這種團結是毫無原則的。他以我們所要求於一個共產黨員的組織性紀律性來要求一個落後工人，因而對她做出無情的判決。對於這個人物的這種處理方法，無論從藝術上或實際上說，難道是正確的嗎？

工人階級要團結和領導全國人民必須首先自己團結一致。積極分子應當成為團結的骨幹。但是積極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却恰好是個人突出、脫離羣衆；而這種毛病在競賽中就特別容易顯露出來。大梅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者。美蘭的本位主義不過是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另一種表現罷了。因此在生產競賽中必須強調個人模範與集體模範相結合，先進的幫助落後的，英雄帶動大家，這

才是真正新的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一切個人突出、驕傲自大、本位主義等等，也都是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壞習慣和壞思想。劇本中對張大梅這個人物給予了適當的批評，是完全必要的，有教育意義的。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在這裏，毛主席明確指示了：第一，必須充分估計，反動統治者所給與人民思想上的壞影響是很大的，並將長期存在的；第二，人民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必須採用民主的方法。

要啓發和提高工人的自覺性、積極性，主要關鍵就在管理民主化；工廠管理人員在工作中要走羣衆路綫，要有民主作風。《紅旗歌》表現了工人在生產戰綫上新的勞動態度（包括團結互助）與舊的勞動態度之間的鬥爭，同時也表現了工廠管理上兩種不同的作風，即彭管理員所代表的民主作風與萬助理員所代表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

的作風之間的鬥爭，這兩種鬥爭交錯着，就構成了『紅旗歌』的全部主題。

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思想根源是甚麼呢？主要就是『看不起羣衆』。萬國英根本不相信工人的覺悟。他說：

『……工人生成的就是想多掙錢、少幹活兒，管理上就是想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低成本。管理和工人根本是矛盾的，……』

『……真要提高生產，達到標準數，只要管理上訂計劃、下命令、有魄力、有信心、勤查勤管，有錯就罰，就會完成任務，根本用不着發動羣衆，根本用不着讓她們自個兒管理自個兒！』

在他看來，甚麼『民主管理』，甚麼『生產競賽』，都不過是『自找麻煩』。萬助理員的這種思想和作風在新解放城市的舊技術人員中是相當普遍存在的。蕭殷同志認為『這個人物也是不够現實的』。他說：『據一般情形，城市解放之後，工人就有訴苦運動，對於有壞作風的人員，一定受到羣衆的批評教育，即令他們在思想上還存留着舊的渣滓，但他們懂得共產黨是反對欺壓工人的，他們絕不敢做得這麼露骨（像萬國英那樣）。即使舊思想偶而冒出來，欺壓了工人，而工人們也絕不會認為他的欺壓行為就是廠方的意志。』這裏所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一般的情形，

城市解放之後，工人並沒有訴苦運動。而舊人員的舊的作風也沒有那樣容易改變；他們習慣了那套舊的管理方法，那跟他們的整個思想和經驗是分不開的。他們思想上存留着的『舊的渣滓』，豈祇『偶而冒出』一下，而是在他們工作中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像萬助理員那樣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不但在新解放城市的舊人員中，而且在老解放區的一部分共產黨員的幹部中，也是存在的。正如劉少奇同志在最近慶祝五一勞動節的講話中談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所說的：『錯誤中最嚴重的是命令主義的錯誤。』我們在生產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中都必須反對我們幹部中的命令主義的錯誤作風。蔡天心同志不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倒認為萬國英是『一個品質很好的同志』，好像他的那種命令主義的錯誤，不過是工作作風上的一點『缺點』，並不嚴重；好像我們今天在工作中所要反對的，主要並不是幹部的命令主義的作風，而是人民羣衆的『落後』。這難道是正確的嗎？

『紅旗歌』批評了萬助理員的命令主義作風，表揚了彭管理員的民主作風，是完全需要的。自然，彭管理員還不是管理民主化的完滿的體現者。但無論如何，他的作風是民主的，他對待自己的階級兄弟，不是『吹鬍子瞪眼』，而是帶着滿腔的熱情與十分關切的態度。他關心他們的

切身利益；他對他們的缺點錯誤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做到仁至義盡的地步。就是馬芬姐也不能不講他好：『你把我當人看待』，這是從心裏說出來的感激的話。

要發動和組織生產競賽，單靠個別管理人員的民主作風和耐心說服教育的方法，當然還是不夠的。生產競賽是一個廣大工人羣衆的自覺的運動，是行政管理上一個巨大複雜的組織的工作。沒有堅強的黨的政治領導和工會的積極活動，沒有黨、工會和行政組織在工作上的良好的配合，競賽是發動不起來的，即使發動起來也是不能堅持下去的。『紅旗歌』的主要的也是比較嚴重的缺點就是沒有很好地表現出工廠中黨的領導和工會活動的作用。不錯，彭管理員、老劉、金芳都是代表黨的人物，但是看不見黨的集體的領導，只看見彭管理員一人『單鎗匹馬』。黨員的形象顯得沒有力量。具有光榮的鬥爭傳統的上海工人，看了金芳這個人物，就覺得她太軟弱了，不夠他們所理想的共產黨員的水平。他們的這個批評是很對的。工會的活動也太少，幾乎完全成了行政的附庸。工會分會主任老劉的一個重要活動，就是送配賣麵到馬芬姐家中，並送還她的圍腰、證章，通知她回廠，這一件事引起了正在絕望中的馬芬姐思想上情感上激烈的變化，使她走上最後的轉變。工會關心工人的物質福利，並在可能條件下改善

工人生活，對於啓發和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鞏固他們的勞動紀律，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作為共產主義學校的工會，應當抓緊一切機會對工人進行階級的政治的教育；作為工會分會主任的老劉卻沒有盡到這樣的責任。他對馬芬姐的錯誤沒有進行過一次認真的批評。不但是他，就是彭管理員、金芳，在對待馬芬姐的錯誤上，耐心說服是很够的，但有些地方却表現了過多的感情的遷就。就團結和教育的方法上的這種缺點來說，蔡天心同志的批評是對的。新社會的勞動紀律所以與舊社會的勞動紀律不同，就在：它是建立在廣大工人自覺的基礎上的；它首先是靠說服教育的方法建立與鞏固起來的。但在工人自覺水平不齊的情況下，不能僅僅限於說服鼓勵的方法，同時還要採取必要的強制手段來對付好吃懶做、破壞勞動紀律的分子，雖然馬芬姐還不是這樣的分子，她還不是真正存心破壞生產。

在《紅旗歌》中，工廠的正規的民主管理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這種制度是必須通過工廠管理委員會和工人代表會議等等組織形式才能正式建立起來的。這個工廠不過在管理民主化上走了第一步。《紅旗歌》中的競賽也帶着生產競賽運動的初期的、甚至自發的形態。我們看到工人一經解放就立刻爆發出空前未有的勞動熱情，這股

熱情是蓬蓬勃勃的，但還沒有凝結起來，形成新的生產秩序與新的勞動紀律。《紅旗歌》的許多場面給了人一個印象，好像在這競賽中工人們並不在緊張生產，而只是在爭執和吵架，這固然是爲了展開劇中人物的思想鬥爭，並且因爲正面表現生產過程受到舞台的限制，但同時也反映了這個工廠的生產領導還沒有完全納入正規。《紅旗》競賽也還祇是單純依靠工人的生產熱情和提高勞動強度，而還沒有轉入到節省原料、減低成本、發明創造、改進技術的方面去。現在我們的工業生產，我們的生產競賽是前進很遠了！在東北，展開了羣衆性的新紀錄運動。這個運動已由個人的新紀錄發展到集體的新紀錄，由單純提高勞動強度的新紀錄發展到改進技術操作、生產保安和發明創造的新紀錄了。因爲《紅旗歌》中的競賽還是初期的，在這競賽中進步了、轉變了的張大梅、馬芬姐、萬助理員，他們的進步和轉變自然也還祇是初步的，基礎不穩固的，在他們面前還等待着有更多的考驗。

《紅旗歌》正是反映了我們工業生產戰綫上的初期的情況和缺點。作者對於當時的情況自然也還是沒有反映得完全，他更沒有比現實看得更遠。

《紅旗歌》沒有足夠地表現工廠中黨的領導與工會活動的作用，但卻過多地、不適當地描寫了馬芬姐的孤僻、

頑強的性格，使工業生產上的嚴肅的思想鬥爭，在某些地方變成了大梅和芬姐兩個不同性格的衝突，這形成了這個劇本的另一方面的缺點，削弱了這個劇本的教育意義。馬芬姐的轉變，在第三幕是已經完成了的，但爲要表現馬芬姐的那種特出的性格，作者故佈疑陣，使觀衆擔心，不知她到底轉變沒有，而當看到她最後那麼熱情、那麼激動地表白自己態度的時候，觀衆的心理就受到了更大的安慰和鼓動。這種戲劇的效果，就恰恰顯示了藝術創作上有害的人爲的痕跡。對馬芬姐性格的某些過分的不適當的描寫，蕭殷同志的批評是正確的。

我對於《紅旗歌》的意見，大體上就是以上這些。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指正。